

日本侵华既定战略进攻方向考察

徐 勇

海峡两岸所讨论的侵华战争初期日军进攻方向,实指日军在战略进攻阶段,如何通向其进攻顶点,即攻占武汉的基本路线。过去在讨论中,忽略对日本战略方向意图的考察,本文拟综合考察其历年计划方案,缕析其基本线索。

一

武汉素称“九州通衢”,为我国中部水陆交通枢纽和最发达工商业城市。控制了武汉,即意味着控制了中国大陆腹心要地。武汉所具的特殊战略价值,早就引起了日本战略家的高度重视。1887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要员小川又次大佐炮制《靖国征讨方略》,要求在对华全面战争中,派出一支战略大军协同海军,利用长江通道攻占武汉并设立战略集团司令部,以达到“据长江”的“持久之计”。这大概是日军统帅部最早、最为完整一份攻占武汉方案。^①

其后日本以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将此战略构想付诸实施。19世纪末,日本沿长江上溯,掠得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等多处利权。1905年8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确实扶植帝国在汉口方面之利权,并对清国将来之发展作好准备。”^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日本乘机向武汉地区派驻军舰和地面部队,于同年底组成“中清派

① (日)小川又次:《靖国征讨方略》,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日)《帝国陆军编制总览》,芙蓉书房昭和六十二年版,第49页。

遣军”(后称驻汉口守备队),首任司令官是尾野实信少将,下属司令部一个,步兵2—3个大队,另附机关枪队等。该部队成为插入^①中国中部腹心地区的一柄匕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入山东地区,提出了旨在全面控制中国的“廿一条”,作战问题随之纳入陆军计划日程。1918年,日本对1907年制定的《国防方针》作了第一次修改,在原定攻势国防方针的基础上,要求作好对多国同时作战与持久作战的准备,同时还修订了《用兵纲领》和年度作战计划等方案,提出了大规模侵华作战构想,其要点是:

待时机成熟,要从近海四个方向进攻中国:第一是满蒙地区,中心范围在满洲南部;第二是华北地区,范围包括平、津以及从青岛到济南的山东半岛;第三是华东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及杭州湾等地;第四是福建以南地区。也就是这次修改,规定要进攻中国腹心要地武汉,办法是以海、陆军部队与汉口的守备队相互呼应,“沿长江逐次跃进”攻占汉口。^②

5年后,日本的《国防方针》又作了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过的《国防方针》,明确对汉口的进攻方向:“以(华北)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扬子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在汉口附近作战。”^③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东方的扩张势头受到一定遏制,1922年5月日本被迫将驻汉口守备队撤编。但它仍然十分重视武汉的战略地位。1925年日本组成大型军事调查团,乘军舰对自上海至武汉的长江各要点进行了大规模侦察,调查团由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畠俊六大佐为团长,成员包括海陆军各分营作战、情报、要塞、船舶等方面官员,活动时间长达一个月。正是这位畠俊六,13年后官升大将,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直接指挥了进攻武汉之战。

① (日)《帝国陆军编制总览》,芙蓉书房昭和六十二年版,第27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昭和四十九年版,第223页。

③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

在这次大型侦察活动基础上,日本制定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中国为首要作战对象,对华作战使用16个师团,约为总兵力50%;进攻方向分东北、华北、华东与福建等4个方面。其中对武汉的进攻明确规定从华东上海开始,作战部队统属上海方面的战略集团,兵力暂定以1个军3个师团为骨干。^①该计划是20年代日本最重要的一份策案,为后来历年计划案的蓝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对关内地区各作战方向规定最为详尽的方案是1935年度作战计划。该计划对于长江一线的作战同样十分重视,强调“不仅对于上海,还有南京、汉口、长沙、重庆等处亦需派出舰艇。对该方向之用兵作战应特别予以关注”。其步骤是:陆军第九军(以3个师团为骨干)在海军协同之下,在扬子江下游地区登陆,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其后“根据情况令华北方面军沿京汉线南下与之呼应,沿长江对汉口作战”。^②

通过对上述各时期日本作战方案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关于日本对武汉进攻方向的结论如下:武汉是日军对华作战构想中的进攻远点,长江为其深入并分割大陆内地的基本通道,溯江西进武汉为日军既定的战略主攻方向。日本确定了上述以武汉为控制中国的“大局要冲”的战略。由此看来,何应钦、蒋纬国等国民政府要员所论证的日本“原订由北向南之战略”即其“进攻轴线”并不存在,而大多数台湾学者所赞同或沿用的说法:“就原定计划而言,(日本)决不能将其兵力用在长江流域……”,更悖离了史实。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确定溯江西上以攻取“大局要冲”武汉的战略呢?这是由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地理环境等条件决定的。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大体沿西太平洋岛链构成北南带状态。与此相对应,其进攻目标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及华南等中国各地区。

^① 戟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01页。

^② 戟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68—369页。

因此日本的侵华作战必须跨海西进,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的战略进攻方向。

跨海西进,由水路入侵中国腹地,从交通方式和海军力量的对比看,都能较大地发挥日本的军事优势。中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半封建农业国,日本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海洋国家。自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中国海上力量一蹶不振,完全失去了制海权,包括长江三角洲等滨海防线,直接裸露在日本军舰炮口之下。日军侵入中国大陆之后,同样重视发挥水路作战优势。从水陆运输成本方面比较,水上运输运力大而成本低,除了没有水道的地区之外,尽可能利用水路并借助水上力量作战,对日本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以华北战场为例,1937年9月,日本曾部署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主作战”,中心目标指向石家庄等地。主攻以第一军3个师团沿平汉线南下,另以第二军所属2个师团沿子牙河与滏阳河溯流而上,指向石家庄南部地区。据日军战史统计,子牙河上日本运输船只最多时达1345只。^① 众所周知,华北地区平坦开阔,河流较少,不利于大规模航运而有利于地面机械化部队运行。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日本在这样的地区竟充分有效地利用了滩多水浅的普通河道子牙河,日军对水道的重视及其技术力量的娴熟强大,这是一个明证!

在武汉和长江方向作战问题上,人们注意到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以通行于平原陆地而会受阻于水道,却忽略其拥有军舰、摩托艇等水面先进装备和利用水道的长处。现代军事力量应包括陆、海、空多个层次,把眼界拘束于陆界之内,这自然要对沿平汉线南下与溯长江西进的战略价值作出错误评估。请看这几种说法:

首先,以何应钦的说法为代表:“日军将其原可由北平南下汉口最有利的作战线,改采由上海西向汉口最不利的作战线。”^② 这

^① 戟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81页。

^② 何应钦:《何序》,载《抗日御海》(一),(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5页。

里的最有利与最不利的比较,完全忽略了日本作为海洋强国的基本优势。

其次,蒋纬国及其他论者强调:日本若自北向南进攻武汉,“则将使我位于平汉和粤汉铁路以东之主力,与后方基地隔离,陷反正面和背海作战之极不利态势”。^①此论值得商榷:“背水”或“背海”概念,从战术角度而言,应有一定的距离限制,自武汉无论以东或是以南至海,均有上千公里大陆,地域如此宽大,不乏回旋余地,还能称之为“背”么?古来“背水”之说,例如韩信“背水”作战是在河边列阵。倘所“背”之所漫无边界,那么中国在华北抗战,不也可以说是日军逼中国“背”渤海或黄河之水作战么?

再有论者引征古代游牧民族南下战例,证明日军机械化部队沿平汉线南下为最佳选择。此例实不足取,游牧民族或居塞北,或处关外,有力量时拥骑南征,当以自北而南为必然方向。而日本是东方岛国,不跨海西向,怎能把主要力量挪到中国北边来呢?日本固然是攻占了中国东北,可用东北为南进战略基地,但东北毕竟是日本本土,东北既可为日本所利用,亦可对其牵制。日本屯驻东北的关东军,兵力只增无减,始终是其海外最大的战略集团之一,这种屯驻本身就是被牵制的表现。至于日军要征服人口密度更大,抗战力量更强的华北,以其作为战略基地,又谈何容易。

通观15年侵华战争全程,日本先后占领中国近海的东北、华北、华东及华南等近海战略地区,乃以其海上力量作为后盾;而其深入大陆武汉地区,则以长江干流为依托。与此对照,日本对大陆南北交通干线的进攻与控制,相形见绌。1944年为挽救面临崩溃的战争全局,日本曾拼凑全力进行大陆交通线作战,一度贯穿了平汉、粤汉等线,但得而复失,该线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故日本的侵华战略,概言之就是江海战略,以其水上力量联络或支撑其各个战场;而中国则利用复杂而广阔的陆地进行持久周旋。江海战略

^① 蒋纬国:《抗日战争指导》,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29页。

与大陆战略的对抗,正是日中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特点之一,也是日军制定溯长江攻武汉战略的必然性所在。

二

跨海西进,沿长江攻打武汉,是日本的既定战略。但日本的全面攻势发动之后,却迟迟未能实施对于武汉的既定攻势。其凶锋首指华北,继向上海,再攻徐州。于是日本总体上的跨海西进,与为逐次达成作战目标而忽北忽南的战役方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在关内大陆战场上扑朔迷离的多向的作战行动。但这并不说明日本放弃了既定战略。这种受其形势判断和作战目标以及速决企图所制约的战役性的方向变化,不能与总体的战略进攻方向混为一谈。

日本侵华战争的最高目的是征服中国。但它严重低估中国的抗战意识和能力,认为只要“对中国予一击,就能打开局面”^①,甚至认为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就可以征服中国。基于这种错误判断,日军当局企求速战速胜,幻想不用付出太大代价就能获得最后胜利,这直接影响到日军进攻方向等重大战略问题的抉择。华北方面军在七七事变后曾提出所谓“双重目标战略”,要求将战争重心放在华北,首先打击第二十九军,继而打击北上的中央军主力,企图在1938年初实现迫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驻上海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则提出“单一目标”战略,要求“欲制中国之死命,以制上海、南京为最要”^②,即要求集中兵力于华东中国的政治经济心脏地区一战而胜。

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实际推行的为陆军方案。1937年7月底,击败第二十九军,攻占北平天津两大要地后,日军在华北全面展开,实施在河北中部地区对中国军队“决战”。但战局未按日军愿望发展,中国举国奋战,华北、华东各地的战争形势,迫使日军数度改

① (日)《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第135页。

② (日)《现代史资料》(9),美铃书房,第17—18页,第186页。

变其作战计划。首先,日军集中主力,编组华北方面军进行的华北作战,其战略任务规定为:除确保已占领的平津地区,还要“以挫败敌之战斗意志,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迅速击灭河北中部之敌”。^①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总之,日军统帅部最初的考虑是“以华北为重点”,“准备在10月底前后积极地将事变加以解决”。^②

但战局的发展打破了日军上述愿望。八一三事变后,中国调更多的主力部队投入沪战,予日军以重创。9月,日军在该方向伤亡为华北方向的二倍,日军惊呼该方向陷入“苦战”,要求尽快“打开上海方面的悲惨战况”。^③

日军统帅部于10月12日决定将“主作战”从华北转至上海方面,编成华中方面军,规定其任务:“应与海军协力,以顿挫敌之战争意志,取得结束战争局势之契机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④由华东日军接替了原拟在华北实现的结束战争的战略任务。

在上海、南京战败后,中国政府仍然坚持抗战,而华东、华北日军为扩张战果曾进入山东,于1938年3月在台儿庄作战失败。日本针对集结于徐州方面的大量中国军队,调集7个师团,企图在徐州来一次“准决战”,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使中国丧失抵抗力量。按日军的形势判断,中国政府没有投降,可能是所受打击不够,只是“末梢出血”,于是决定再刺“心脏”,并认为“心脏”就在徐州。而徐州作战结果更使日军严重失望。

至此,日军企求速决而忽北忽南,狼奔豕突,但耗时一年,终于发现速胜企图完全破灭,战争遥遥无期,不得不重新思考占领武汉的既定战略目标。既然日本早已把攻占武汉作为战略远点,为什么没有从一开始就直接进攻武汉呢?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在速决战

^① 戟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73页。

^② 戟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190页。

^③ 戟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97页。

^④ 戟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93页。

方针指导下,企图尽快抓住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一举摧毁中国抗战意志与力量,“河北决战”、“徐州准决战”,都包含了日军的这种企图。这种军事上的投机未能成功,日本只能又回到既定的战略进攻方向上来,武汉作战就成了关键。6月,近卫首相智囊团“昭和研究会”炮制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强调:“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这样一来,即使该政府逃到四川或云南,以保持余命,但在这种山岳地带,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政权更大的作用了吧。”^① 6月18日召开的御前会议在决定本年实施武汉之战。6月24日召开的五相会议强调:“应将国力集中指向于直接解决中国事变,以大致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为前提。”当然,鉴于一年来的作战体会,日方对此并不乐观。素称强硬派的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强调,武汉之战对于全局获胜是“唯一的同时不妨说是最后的机会了”。^②

按日军统帅部命令,华北方面军只以部分兵力进攻郑州作为战略配合,整个对武汉行动由华中(东)派遣军担任。6月18日统帅部明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于扬子江及淮河正面,逐次占领前方地区为尔后作战作好准备。”^③ 8月22日,日军按既定方向实施作战。华中(东)派遣军分北、南两路向西攻击前进。北路由华中派遣军第二军所属4个师团又1个重炮兵旅团等部,沿淮河向西进击,其任务是突破大别山防线进攻平汉线信阳等地,尔后南下进攻武汉;南路由派遣军第十一军共5个师团又1个重炮兵旅团及相当于小型师团的波田重一中将所率台湾军支队,沿长江西进直指

①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页。

②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548页。

③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544页。

武汉；派遣军直辖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二及第一一六师团与航空兵团等部也曾部署或直接投入长江方向作战。沿淮河方向前进的第二军的集结线和补给线共有3条：一是由津浦线经蚌埠南下庐州（合肥），二是经由海路进长江在安庆登陆北上，三是在浦口登陆向西北进击。^① 就是说，北路集团第二军，也需要部分甚至大部地以长江为依托。

通过对上述实战考察，可以发现：沿长江西进武汉，既是日本多年的计划方案，更是实战的事实。有的论者认为，日本攻占南京之后北上徐州，徐州战后再攻武汉，那么对武汉的进攻方向即为‘南下’方式，并藉以论证国民政府的应战方略。这种论述过多强调了徐州同武汉之间的北南方位，而没有具体分析日军进攻武汉的实战路线，是值得商榷的。

或问，难道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提出过以沿平汉线南下为主攻方向的建议吗？这种建议当然是有的，但多提出于南京之战与武汉会战之间。例如华北方面军曾主动请战于‘攻略汉口’，“沿京汉线牵制中国军队并南下”。^② 当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桥本群也回忆说：“作为汉口作战方法有沿京汉线南下和沿扬子江溯江而上两种办法。”^③ 但南下方案终因其‘不利’而未被采用，因为华北占领区本身‘治安混乱’，华北日军集团只能以一部攻击郑州，‘以佯动牵制敌军’。^④ 可知，由华北南下之计虽曾提出过，但它未能取代自20年代以来多个方案所确认的溯长江西上方案，或因实际情况未能施行。

日本战史申述得十分清楚：‘唯有制霸长江，才是攻略汉口之

① (日)井本熊男：《中国事变之作战日志录》芙蓉书房昭和五十三年版，第240页。

② 戦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544页。

③ 桥本群中将回想问答录》，见《现代史资料》(9)，(日)美铃书房1984年版，第342页。

④ 戦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544页。

捷径。”^① 由进攻上海而进入长江, 由用兵长江而夺取武汉, 由夺取武汉而控制中国腹地, 最后争取战争胜利, 为日本侵华战略的基本思路。

三

既然溯长江西上武汉为日本既定战略, 沿平汉线南下案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当然也就谈不上改变日军作战方向问题。不过, 笔者认为, 不管日军有无南下案, 中国一方都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分析日军的进攻方向, 以采取相应回应, 因此, 关于中国国民政府是否转移日军进攻方向的讨论, 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国民政府的应战方略, 还是有意义的。

揆诸史实, 蒋介石固然担心并分析过日本的南下方案, 但更多的证据显示,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基本判断是, 日本将以上海南京和长江为主攻方向, 并作出了相应的防御部署。

1934 年蒋介石所发表论证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章《敌乎? 友乎?》, 已经估计到日本将“能占领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② 1935 年国民政府明确以大西南为抗战基地: “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 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 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 甘滇为后方。”^③ 当年划出三道防卫区域, 1936 年划出四大战区, 规定全国预定战场有北正面、晋绥侧面、东正面南海岸及警备区等几个方面。东正面以江苏省所属京沪阵地及浙江省沪杭阵地为主防卫阵地。1937 年上半年, 江苏、浙江、山东等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 其中又以京沪杭地区的吴福线、锡澄线等国防工事规模最大, 质量较好。武汉外围国防工事自 1935 年夏动工, 北起武胜关, 南到城陵矶, 东至长江北岸田

①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 第 16 页。

② 何应钦: 《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附录,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3 年版。

③ 张其昀: 《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 2 册, 台北 1979 年版, 第 747 页。

家镇,断续建设近二年。对长江要塞江阴、镇江、南京、安庆、马当、九江、田家镇及武汉等处工事进行了整建,有的还装置了从德国进口的要塞重炮。可见,京沪杭地区及长江一线为国防工事建设的重点。

配合上述军事部署,国民政府在经济布局方面也有相应的安排。1935年国民党“五大”通过《精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指出:“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际,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①同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于1936、1937年两年度分别拨款1000万元、2000万元作为重工业建设费用,先后设立中央钢铁厂以及四川油矿等大型厂矿二十余家,均分布于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与青海等内地。上述军事与经济方面的实际部署,若不是依据对日本主攻长江的认识判断,是难以让人理解的。一些批评论者认为国民政府在上海长江方向没有明确的抗战动机,缺乏说服力。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明确判断日军将以长江为主攻方向,这在当时并不算太高深的预测,甚至可以说是战略界明眼人的共识。例如,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早在2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日本军界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异常关注。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蒋百里就提出过要多造汽艇充实水上力量,以便于在该方向同日本对抗。^②1935年8月20日,蒋介石聘请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向蒋提出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强调对日作战的战备方向:“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即范围广大是也,于是直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法肯豪森预测日本对关内的全面进攻将兵分三路:第一路攻击河北至郑州方向;第二路攻击山东与徐州方向;第三路“进出长江,攻击首都,沿江向上进至武

① 罗家伦:《革命文献》,第75辑。

② 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3页。

汉”，并认为该路为日军兵员最多之路。^① 后来的战局发展与法肯豪森的预测大致吻合。而法肯豪森的诸多建议，包括以四川为根据地，强化长江防线等，亦为蒋所接受并加以实施。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曾任过北伐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将军，也曾自苏联向蒋传送建议，要蒋注意两大战略方向：“沪为京之门户，关系国际，平绥西达五原，威胁中苏交通，应注意。”^② 在上述诸多讨论分析的影响之下，蒋介石明确判定日军攻击首都南京溯江西上为其主攻方向并作出应战部署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关于国民政府的应战方略，即以上述判断日军将主攻南京长江方向而做出抵抗，应该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对于当时的华北和华东两大方向战略价值又如何评估呢？批评的观点认为在上海大规模抵抗是失误，应改于华北作更大规模抗战，因为淞沪战场不具备‘转换全局’的意义，故应以华北为重心。笔者认为，所谓转换全局，也就是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转折性变化，它必须具备力量对比与相应的时空条件。而在当时，华北地区与淞沪地区都直接临敌，没有足够的可以抵消日本冲击力量的空间，所以都不具备在大战初期就可以‘转换全局’的条件。后来的实践证明，由蒋百里率先提出的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一线为国防线，是比较实际的。

对于长江方向特别是上海的战略价值绝不能低估。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上海是日本对华扩张必争之地。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首都南京门户，也是当时东方最大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从东亚战略地理角度观察，上海居于大陆海岸线中端，与日本九州岛、冲绳及台湾殖民地隔海相望，处于这一弧形岛链的焦点位置。故上海是中国沿海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故此，中国在上海和长江一线作坚决抗战，是完全应该的，必然的。当时任国民政府大本营参谋部作

① 《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第24—27页。

②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38页。

战组长的刘斐总结说：“上海一战，对于整个抗日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很大的价值。首先，上海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有利于全国总动员；其次，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上海抗战可以扩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第三，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在这里进行坚强的作战，可以正国际间对中国的视听；第四，打乱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了主动；第五，上海是我国工商业中心，群众觉悟程度高，群众运动的影响可以振奋全国；第六，可掩护沿海各省工业、物资向远后方撤退。”^①

笔者认为，在全面战争业已爆发的形势下，日本攻上海入长江之举，不是有无问题，而是早迟问题。如果没有淞沪方面长达三个月的坚决抗战，让日本主动选择时机实施既定计划，沿长江深入，中国必将面临更大的战略被动。这是评估国民政府应战方略是否正确的不可忽略的基本点。

中国军队在长江与淞沪地区所作一年多的顽强抗战，打破了日本的速决企图，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更挫败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既定战略。百万日军被迫扩散于旷野巨川之间，进退维谷。完全可以说，两军胜负的天平，是在长江水道面前显示出了最后结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2—3页。